



刘玉平著

编誌實踐录

黄山书社

编 志 实 践 录

刘玉平 著

赠给烟台师院中国近现代史
史料学会研究部，并以
此祝贺学会成立。

济宁市政协文史编辑部 刘玉平
92.8.26

黄 山 书 社

1991 • 合肥

责任编辑：沙宗复

封面设计：田兆琪

编 志 实 践 录

刘玉平 著

*

黄 山 书 社 出 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济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125 插页：1 字数：130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ISBN7—80535—328—X/K·102

定价：3.25 元

序

在地方志工作蓬勃开展的今天，随着方志成果的不断涌现，方志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也在日趋深入发展。刘玉平同志编写的这本《编志实践录》就是从实践的角度，探讨了地方志工作特别是县级志书编纂工作的一些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上去认识，有一定的研究见解和借鉴价值，值得一读。

我国地方志起源很早，迄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地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所决定，地方志源远流长，经久不衰，以至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省以至全国各地地方志事业蓬勃兴起，这正是我们对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所不同的，是要用新观点、新材料和新方法编纂社会主义的新方志，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和长远需要服务。

尽管地方志历史悠久，方志遗产又那么丰富，但由于多种历史原因所致，地方志至今没有真正形成独立的学科。尽管随着地方志的日益兴盛，方志学者对方志理论的研究也在不断开展，并时有长进。但是，作为较系统的方志学理论，只是到了清代才逐步形成，迄今也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又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旧方志理论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观点的指导，没有也不可能正确地看待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因而它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理论来源于实践。旧方志学理论来源于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修志实践；新方志理论只能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实践中产生。当然也还有个对旧方志理论进行批判地继承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今天，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在此基础上，要逐步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志理论，进而使方志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志理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总结现实的修志实践经验上。从大量的新鲜经验再升华到理论的高度，进而指导修志实践活动。

本书作者从事地方志工作已八年之久，热爱方志事业，善于学习，肯于钻研。由其主编的《邹县简志》和《邹县旧志汇编》出版后，受到史志界的关注和好评，还获得科技进步奖，的确令人鼓舞。与此同时，该同志还在省内外方志刊物上发表不少理论探讨或介绍工作经验方面的文章。这种勇于探索、积极追求的精神是很好的。本书就是作者近年来所发表的方志方面部分文章的结集，也是对其修志实践的经验之谈，愿能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当然，本书所谈及的问题未必尽善，甚至有些认识也未必成熟，但终归是个人亲历实感。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我们愿广大的修志工作者都能认真总结自己的实践经

验，为共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方志理论，促成社会主义新方志学的建立而努力。

席星加 骆承烈

注：席星加同志为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编审、《邹县志》学术顾问。

骆承烈同志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山东省志》特约编纂、《邹县志》学术顾问。

目 录

序..... (1)

论地方志工作的现实意义..... (1)

史志与文史工作关系初探..... (12)

论方志主编的工作..... (20)

邹县历代修志及其版本概述..... (31)

《三迁志》版本考要..... (56)

峯山历代史志编修及版本考略..... (67)

我们是怎样开展史志工作的..... (81)

写在《邹县简志》与《邹县志》之间..... (89)

附：部分专家教授关于“两志”的评论摘要.....(102)

新编《邹县志》的基本构想与实践

——兼论方志工作若干问题.....(115)

方册揽鲁志 一书窥全貌

——简评《山东方志汇要》.....(158)

成功的尝试 丰硕的成果

——简评《泗水县志·初稿》.....(163)

《经济管理志》编写初探

——兼评《汶上县志·经济管理》……………(170)

《滕县志》首发之感怀与启迪……………(185)

论地方志工作的现实意义

编纂地方史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盛世修志，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邹县，是一个拥有近百万人口，面积为1588平方公里的大县，孔孟之乡，古之邾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又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上曾爆发过文贤教起义和反洋教的斗争。在历次革命斗争中，党领导全县人民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建国三十五年来，全县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向了经济建设，全县各条战线的形势蒸蒸日上，令人振奋。当前，全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正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各方面的改革，为富民兴邹，提前五年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为建设文明县而努力奋斗。值此空前盛世，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回顾历史，把党领导人民谱写的无数光辉篇章整理起来，把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历史的过程和成果记载下来，把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状况记入史册。这是全县党政军民义不容辞的一项任务。

那么，地方志工作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本人根据上级

文件精神，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重点阐述一下地方志工作的现实意义，顺便谈及如何搞好地方志工作的问题。

先说什么是地方志，地方志是记载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与社会各方面情况的资料性著述。凡是这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自然形势、历史沿革、名胜、人物、乡土扶闻等无所不载。所以又称为“博物之书”、“百科全书”。从历史上看，地方志是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相应地发展起来的，方志的起源很早，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人说还要早些），形成于宋元，盛行于明清。特别是明清两代，各省、府、州、县无不修志，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若干部官修或私撰的志书。历代相继编修的大量志书，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我国地方志的收藏有一万二千八百多种，占全部古籍总数的百分之十四点四。据查考，邹县编修地方志始于明代，盛行于清代，有官修，也有私撰，仅据《济宁地区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邹县就有十二部旧志，加上一九六二年中共邹县编史修志委员会编的三卷本《邹县新志》，共计十三部。另据有关资料记载，明代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九六二年间，编修的各类志书不下于二十种，是一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年隔久远，历史战乱，旧社会各种条件的落后以及十年浩劫等原因，这些志书县内今存者甚少，大部分散失在民间和外地，如今能够找到的寥寥无几。新编地方志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去开拓性的编纂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

一、编纂新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

纵观中国历史，隔代编史和当代编志，已成为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特有形式。它的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纵贯古今，横及百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历来为人们所重视。明代永乐、正德，清代康熙、雍正皇帝，都曾诏令全国纂修地方志。地方官上任，总是要先查阅一下地方志，唐代韩愈过岭，借阅韶州“图经”；宋代朱熹下轿，便问南康郡志，这都是史书上记载了的。历代统治者所以如此重视地方志，其目的是为了“资治”，即从中寻找其治理国家，治理地方的借鉴，以便巩固其封建统治。所以古代有句话叫做：“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唐太宗李世民就说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史记》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刘邦的军队占领了咸阳，将士们都抢拿秦宫中的财物，只有萧何派兵把律令、图书之类的档案资料看管了起来，后来刘邦就是从这些资料中了解了各地的山川、地理、户口、风土人情等情况，从而夺关隘、占要津，打败了项羽，得了天下。而项羽是一介武夫，不懂得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大概是没有文化吧。当他打进咸阳之后，将士们烧杀抢掠，把个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烧了个净光，所谓“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项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这里，我们不去研究这些历史人物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只想说明掌握资料对于了解情况，实行战略决策的重要作用。而编纂和研究方志，就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东西。

旧志书中虽然保存了一些有用的资料，而其主要内容无不是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以树立帝王及官吏们

的权威，无不诬蔑贬斥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以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旧方志精华与糟粕杂陈，不能为我们充分地提供正确的历史借鉴，因而也不适应我们新时代的需要。因此，编写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地方志，使之有益当代、惠及后世，这一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过去战争年代，戎马倥偬，顾不上编志；十年内乱是非颠倒，谈不上编志；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完全正确，拨乱反正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有很大的发展，各项事业正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当前的大好形势，为编写史志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自古“盛世修志”，我们现在是躬逢盛世，应该抓紧开展地方志工作，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是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研究和编纂工作的，早在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曾指出：“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倡议编修地方志。同年八月周总理指示，要系统整理旧志，把各地地方志中关于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资料整理出来，做到古为今用。当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并在《十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中提出了编写地方志的任务。大家还记得，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央倡导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曾经出现过编写地方史志的热潮。同时，群众编写社史、村史、厂史、家史也很活跃。但是，这项工作在十年“内乱”中完全停顿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提起了这件事。陈云、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要全党重视研究党史、革命史、

地方志。胡乔木同志亲自过问这项工作，并且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各地的地方志，过去不同时期，不同的统治阶级都做过一些工作，现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应该比过去做得更多、更好、更科学。不应让地方志的工作在我们手中中断，如果中断了，后人就会很困难”。胡乔木同志还说：“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陷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此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相继发表文章，阐述编写地方志的重要意义。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下，地方志工作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起来。这说明编纂地方志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党和人民所需要的一项重要重要的文化建设。

二、编写地方志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当前，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工作着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集中全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号召我们：“要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所谓“大事”和“全局”就是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总任务、总目标。这个总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所领导的各地方、各部门和各单位的一切工作，都应自觉地服从于、服务于这个总任务和总目标。所谓“管本行”，就是要把各自的工作做好。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必须了解本地区、本行业的历史和现状，就必须了解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这样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我们邹县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

这是个经济战略问题，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才能摸清摸准。而编纂地方志就可以汇集各种资料，提供需要的信息，为经济战略研究服务，为四化建设、翻两番服务，为了解县情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毛主席早就说过：“革命领导人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现实的理解，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地方志是记述一方之自然与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书。一书在手，全局在胸，这对于知县情、管本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地方志在这方面正好发挥作用。

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王众音同志在全省第三次编纂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不能光凭习惯的、简单的经验去指导工作，作出决策，要有政治远见和专业知識；要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历史和现状有比较系统的深刻认识；要有历史的比较；要善于运用智力机构和智力工具。地方志就是可以借助的一种智力工具。如果编写出一部能反映本地区、本行业历史和现状的新志书，那么新领导上任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精力，迅速掌握全面的情况。用现代科学的话来说，就是用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获取最多的“信息量”。

从我县的实际情况来看，确实需要有一部介绍全县全面情况的资料书，可惜现在还没有。多年来我们有些部门要搞什么规划，常常是组织临时班子，现去收集资料，等任务完成了，材料丢在一边，甚至随手散失，以后再搞规划又要重新收集。别说查寻年代久远的资料，就是查找“文化大革命”中机构、人员的变化情况，也要花费不少功夫，甚至有时还查不清，因为没有现成材料。这种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

应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要求了。为了保证本世纪末我县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应当尽快地全面搜集、整理、研究邹县的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编纂成书。有了这样一部书，不论是领导机关还是读者个人，要查找资料、了解情况，翻检即得，这对任何一个单位和部门来说都是件极好的事。在这方面外地有很多好的经验。例如四川省委为了摸准四川省情，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编写了一本《四川省情》，实际是一部简志，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情况通报》上，刊载了《四川省情》的目录并加了按语，称赞他们做了一件好事，这是搞好经济建设的第一位的基础工作，并建议全国各省都仿效他们编写这样一部书。上海市委、市府组织了五十个局级单位、三个研究所、四十多人执笔，一千多人提供材料并参加编写，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编成了一部二百多万字的大型资料书《上海经济》。这部书对于了解上海经济状况，吸引外资，使资料为经济建设服务，起了重要作用。

建国以来，有些地方和单位，利用方志资料，在从事地震预报、气象预报、矿源探查、发展农业和多种经营、建设水利工程、防旱防涝、抗洪抗灾等方面，已经初见成效。这种例子很多，例如枣庄市通过编志发现了漆树资源。淄博市通过编志收集有关资料，协助外贸部门决策，扩大养鸡场，发展了对外贸易。东平县在编商业志中发掘了失传多年的地方传统食品资料，促进了东平县饮食业的发展。这说明编写地方志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使这些资料为经济建设服务就是地方志的一大功用。

三、编纂社会主义的新方志，是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设

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新编地方志不仅反映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成就，尤其要宣传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道德和爱国主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后的今天，一百多年间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邹县大地上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民族精英。有的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英勇奋战，壮烈牺牲；有的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献出了生命。特别是不能忘记老区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她）们送子参军，救护伤员，千里运输，车轮滚滚，全力支援前线，平凡中见伟大，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业绩。地方志就是要充分反映革命前辈和革命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记录新时代的新道德、新风貌，用来激发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社会主义。地方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还可以发挥乡土教材的作用。

四、编纂新方志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掌握客观规律

党中央经常教育我们，要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但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必须调查研究积累资料，研究历史，吸取经验教训，才能真正掌握。有的规律，如作物密

植，经过反复试验，在近几年之内就可以表现出来，为人们所认识。有的规律，如自然现象的变化，往往要经过百年、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认识。毁林开荒，生态被破坏，造成水土流失，灾患频仍，这不就是自然规律对人类的“惩罚”吗？但是这种规律至今还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有一句古语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师”是什么？就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要搞好“后事”，就不要忘记前事，就要记取历史的教训。我们过去有些事情之所以没有办好，就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不记取历史教训，比如“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几年，已经搞得很“左”了，但却说是“右”了，还要再“左”下去，以致造成历史上已经犯过的错误又一再重犯，最后酿成“十年内乱”的严重后果。这也是一种惩罚，因为它违反了客观规律。我们说，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可以运用的，但没有别的“诀窍”，只有老老实实在地承认客观存在，积累历史资料，总结历史经验，从实际出发，不断地研究它，从历史事实的记载和研究中来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从而运用客观规律。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识与掌握了客观规律，我们工作中那些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犯了也容易得到纠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地方志详细地记载人们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史实，记述成功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得到丰富的知识，鉴往知来，把工作做得更好。

总之，新编地方志具有多种用途，是为当代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子孙后代留下精神财富的一项崇高事业，是历史